

时代的讴歌和历史的反思

——评《奔腾年代》

周江伟

摘要：电视剧《奔腾年代》聚焦于新中国火车工业的发展，以人物成长记录时代变迁，试图破解长期存在于影视文本中的家国叙事的悖论，反思社会整合的文化逻辑，并通过人物情感关系所架构的隐喻系统探讨了科学精神和革命理想的辩证关系，在经典的戏剧母题上生发出新意。创作者还探索了艰难时期的艺术表达，在浪漫主义的历史书写中隐含了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在讴歌时代进步的同时不失对历史的深刻反思。

关键词：《奔腾年代》；家国关系；社会整合；历史反思

作者简介：周江伟，男，博士研究生。（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310000）

中图分类号：J9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0) 05-0087-05

聚焦特殊行业，观照时代命题，是近年来中国影视剧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近年来，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在科学技术和工业、制造业领域奋起直追，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在发展中探索，在探索中革新，是中国所面对的时代议题。《奔腾年代》首次聚焦于新中国火车工业的发展，讲述了中国第一代电力机车人攻坚克难、共同奋斗的故事，展现了中国电力机车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飞跃式发展历程。故事围绕天才工程师常汉卿和战斗英雄金灿烂的事业发展和感情生活展开，通过记录个人成长来展现中国电力机车事业的发展，进而投射大国工业的时代变迁，在“大国小家”的叙述中尽显热血与温情。

一、家国同书的叙事逻辑

在影视剧的历史叙事中，“家”与“国”之间，“单数的人”与“复数的人”之间总是产生一种内在而隐蔽的紧张关系。在经典年代剧《激情燃烧的岁月》和《父母爱情》里，石光荣和江德福在战争结束后回归家庭，他们从一个超越性的历史神话回落到日常生活中。共和国的军人不再是影响历史进程的英雄，而是时代洪流中平凡度日的普通人。角色的转换要求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境遇和价值追求。于是，发现平凡的意义、追求个人的幸福、寻找自我的归宿就成为这些故事的核心主旨。与《奔腾年代》同期播出且题材相近的《激情岁月》则属于另一类历史叙事。主角王怀民为祖国核事业牺牲了情感和家庭，直到因核辐射身患绝症将要离世前，才得以回归个人生活，但已然造成了无可挽回的人生遗憾。相近的情节也出现在传记电影《邓稼先》和《钱学森》里，邓稼先的妻儿承受了无法言说的精神磨难，而钱学森的妻子则牺牲了自己的歌唱事业和艺术生涯。在这些故事中，家庭生活和国家使命被呈现为有待取舍的冲突关系，而个体在超越性价值的感召下，不得不牺牲日常生活的意义。同样展现了中国核事业发展的电视剧《国家命运》则代表着第三种历史叙事逻辑。该剧以全景视角展现了两弹一星的民族奇迹，讲述了一个群像式的英雄史诗。人民领袖运筹帷幄，专家学者攻坚克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秩序下共造奇迹。日常生活和个人命运被历史的宏观视野所遮蔽，个体被嵌入在目的论式的历史秩序中，成为抽象的复数人的代表。

纵观这些影视剧文本，“家”与“国”之间，“单数的人”与“复数的人”之间，总是存在着难以

消解的悖论。雅奇的英雄色彩和俗韧的常人品质,^[1]在创作者眼里成为了一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观照日常和复活人性总要在“去崇高”和“去神圣”的叙事逻辑下进行;书写英雄史诗则必然要走向日常生活的彼岸,将生活世界抽象为大写的真理。

《奔腾年代》给出了第四种破题思路。该剧以“许国以梦、许爱以恒”为主题,试图展现个体与集体、小家与大国之间相互成就的平衡关系。

“造出比螺旋桨飞机还快的机车,和心爱的人共度一生”是常汉卿和金灿烂共同许下的人生誓言。电力机车是常汉卿的毕生梦想,他热爱科学探索,有充沛的好奇心和过人的创造力。他对电力机车研发的热情根植于个人的性格特质和成长经历。而对于金灿烂,电力机车则是弥补人生遗憾的方式。她的哥哥因为蒸汽火车跑不过敌军的螺旋桨飞机而身死战场,让火车跑得更快从而挽救战友生命、实现军人使命是兄长的遗愿,也是金灿烂对他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造出比螺旋桨飞机还快的机车”不仅是个体所背负的国家使命,也是在偶然的私人史中产生出的个体诉求。常汉卿的“阶级成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成为他获信于人的阻碍,而超出常人的知识与眼界,也使他的言行往往不为人所理解。金灿烂则恰好给予了他所需要的信任、理解和支持。金灿烂出身“草莽”,只有通过支持常汉卿的科研事业,才能造出电力机车,实现兄长的遗愿。她为试验机车“掌舵”,既是承继兄长的使命,也是为常汉卿保驾护航。二人相互倾心、彼此成就,构筑了一个温情而圆满的小家。这个小家在时代的风雨中为他们提供庇护,亦在历史的洪流中激励他们前行。正是这种微观的社会活力,驱动了电力机车事业的发展,为大国战略的实现和民族宏图的展开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心爱的人共度一生”不再只是一句爱人间的温情诺言,更满含了在时代的振荡中风雨兼程、共同书写历史的热血激情。

本剧依然可见超越性的感召力和英雄回归日常的人性复活,但其叙事逻辑却已经发生了转置。超越性的感召力不再试图消解家庭生活和个人意义,反而成为了一种积极的因素。在常汉卿信心动摇,即将离去的时候,是金灿烂和战友身上的革命主义精神,将他留了下来。这也成为常、金二人情感关系的转折点,使他们的结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家庭生活被塑造为超越性感召力发挥效用的中介。剧中对负罪者的救赎往往就是通过家庭的中介力量而实现的。冯仕高重新投入母亲的怀抱,才放下恨意,结束偏执的迷途;白曼宁和周铁锤真正成家,才走出狭隘的个人欲望所编织的命运囚笼。而英雄回归的历程,则在复活人性的同时保留了历史神话的维度。金灿烂先后放弃了晋升机会和干部身份,从历史神话赋予她的荣光中走出,成为了一名普通工人。然而她却并没有就此脱离历史进程,随着革命神话的终结,历史转入了发展的轨道,她以新身份进入到新的历史征程中,以常人的姿态书写个体视点里的历史神话新篇章。

《奔腾年代》描绘了国家愿景与个人理想的有机整合,使在世的自我实现和超越的价值追求之间产生一种朝向一致的平衡。这种平衡被塑造为个人实现、家庭美满和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任何偏倚一端的取向,都会带来具有悲剧意味的后果。剧中只有金灿烂和常汉卿的婚姻家庭是圆满的。大姐常汉坤只顾及家族命运,为小家付出了青春而孤独终老;白曼宁和周铁锤只渴求私人的安定生活,却反而遭受了更多挫折;冯仕高为个人情感走向了革命理想和科学精神的反面,最终失去了生殖能力和健全的右腿。而常家白楼被侵占和归还的情节也成为社会失范和秩序重建的象征符号。在这一系列的政治寓言中,“家”与“国”之间,“单数的人”与“复数的人”之间的关系被重新审视,一种平衡的关系得到彰显。

二、多元整合的文化愿景

存在于历史和现实间的社会差异成为了影视创作者构造戏剧冲突的不竭源泉。影视剧关注社会差异引发的社会冲突,也通常会为冲突的消解提供合理的戏剧情境,进而阐发某种社会整合的逻辑。

在既往的影视剧创作中,一元化的整合逻辑相对突出。无论是迷途者向正途回归,还是抱残守缺者被激流清退,最终都试图在社会成员之间构建一种奠基于真理启示的同一性,进而通过异质性的消除来实现社会整合。在《大工匠》里,消亡的是陈旧体制和陈腐观念。固守工人阶级荣光的肖长工在社

会转型的阵痛里饱尝人生下沉的悲苦，而思想活跃的杨老三则顺利融入了时代变迁的激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肖长工同意了杨老三和肖玉芳的感情。两人的和解不是肖对杨的认同，而是将逝者面对现实的无奈之举。随着制造割裂的旧观念的消亡，社会生活被统合在新的思潮中继续向前。而在更多的影视剧里，消亡的则是道德上被判定为恶的成分。题材相近的电视剧《激情岁月》便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坏人被打倒，乱局被扭正，崩解的力量被重新聚合起来共赴正义和光明的前程，这已然成为了一种典型的剧作程式。

然而社会差异并不是总能够被置于一个价值序列中进行排序并据此裁定优劣、予以取舍。任何形式的同一性都寓于多元性之中，共识的达成也难以抹去社会的复杂肌理。一元整合的叙事逻辑往往遮蔽了那些“并列的”、不可通约的异质性，忽视了这些社会差异间的冲突与整合。《奔腾年代》便从这样的关切点着手，展开了一幅多元整合的图景。在剧集中，冲突的根源被解释为傲慢与偏见。冲突的消解依靠彼此的理解和对话，也奠基于对多元生活方式和不同个人选择的尊重，更出于对普遍的、超越阶级属性的人性本真的坚守。常汉坤最终依然保留着文明体面的生活方式，在故事的尾声，她选择回到法国，重温记忆中的异域文化与生活习惯。她所改变的，只是从拒斥和否定金灿烂的生活方式，变成尊重和接纳对方的选择。

《奔腾年代》还试图在更深的层次上谋求多种时代话语的整合。既往表现中国科技事业的影视剧中，被彰显的往往是艰苦奋斗和民族崛起的发展话语，而在《奔腾年代》里，科学精神被推向了前台，在常汉卿和金灿烂具有象征意味的婚姻关系中，实现了与发展话语的整合。此外，一生致力于蒸汽机车研发的姚怀民没有被塑造为陈腐的守旧者。他所代表的稳健而务实的保守主义话语，与常汉卿所抱有的变革创新思想，形成了一股合力，维系着中国的机车研发事业。而总是逃避纷争、力图保全个人利益，将“我是群众”挂在嘴边的王胖子，在剧中并没有受到指责。反而隐含其中的健全个人主义还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那枚火车头勋章就是在表彰他对正义的平凡坚守。多元的时代话语和谐并存，有赖于开放的社会结构和宽适的主流意识，同时也需要一种积极调和的秩序性力量。在剧中吴厂长就是这种力量的具体表现。在他的维系下，具有不同身份、心怀不同观念的工厂成员彼此和解，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了机车事业的发展。

三、人物情感的象征结构

《奔腾年代》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时代的政治符号，他们被嵌入在一个彼此关联的隐喻网络中，成为支撑表层情节的内在结构性力量。这些人物汇集起来，共同讲述了一则鲜活生动的政治寓言。

常汉卿和金灿烂的婚姻关系作为这个隐喻网络的主轴，象征了科学精神与革命理想的耦合。常汉卿代表了单纯的科学精神，他理性严谨、求真务实，但也不免有高傲的精英色彩和疏离现实的书生气质。金灿烂则代表了朴素的革命理想主义，她善良正直、热情宽容，却也会鲁莽冲动和盲目乐观。两种原初而朴素的观念在彼此结合中逐渐走向成熟。

科学技术被嵌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并不是一个孤悬的理性部门。科技从业者不仅要探求真理，也要通达人情，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积极行动。金灿烂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将群众路线写进了常汉卿的科学精神里。常汉卿因田长工计算数据出错，在艰难时刻责令他退出项目组。这种不念人情、只问是非的处置方式，使常汉卿陷入了非议。金灿烂到田长工家里说快板，为常汉卿辩白，才得以平息众议。事后金灿烂要常汉卿“多读读中国这本书，多读读手上有老茧、身上有弹片的中国人。”这种扎根乡土的同理心正是常汉卿抽象的数理知识结构所匮乏的。常汉卿在金灿烂的影响下，不再做闭门科研的知识精英。他开讲座解释自己的主张，用广播全厂直播机车实验，让科学精神走进了大众文化。而面对宝成线试车过程中失责的巡道工人，常汉卿也一改往日的“铁面无情”，他注意到巡道工人所承担的超负荷工作和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为他们请愿开脱。正是在金灿烂的引导下，常汉卿逐渐显示出一个成熟科学家所应有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担当。而革命精神如果一味地扎根于乡土情感，在目的正当性的遮蔽下忽视理性精神和现实问题，则不免走上民粹主义的歧途，陷入天真幼稚的泥沼。价值理性与工具

理性不应该被割裂开来,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和如何实现这样的生活是人类面临的同样重要的问题。金灿烂刚到机车厂时,是一个相信只要主义真问题都能化解的革命英雄,她进厂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快板为科研工作加油鼓劲。然而科研工作所需要的“燃料”并不单是天真的理想和朴素的热情,它更需要冷静思考的空间和社会大众的理解信任。在常汉卿的指引下,金灿烂越来越理解科学精神。她担负起为科研工作保驾护航、协调社会关系的重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具备了日益成熟的政治智慧。最终,金灿烂成为了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为科研事业乃至社会发展引领航向。

金灿烂和常汉卿的结合,离不开吴厂长的庇护与指引,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拟亲关系,这构成了隐喻网络的另一条轴线。拟亲关系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关系结构中,这种仿拟家庭或家族关系而组织起来的因素,对个人的成长产生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的泛家族文化中,这种拟亲关系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2]而“子辈如何成人”便是根植于这项传统的核心命题。在《奔腾年代》中,子辈成人的命题超越了人际伦理的表层逻辑,被转换为朴素的科学精神和天真的革命理想如何成熟的问题。中国古代还存在着一种“代父”传统。^[2]代父就是替代父母行使养育职责的人。而在《奔腾年代》的隐喻系统中,“代父”也获得了一种非人格的意义,他既是现代社会机构中的组织力量,亦是宰制性的意识形态,剧中的吴厂长便是这种“代父”的人格化表征。

在人物设定上,常汉卿和金灿烂的父亲都处于不在场的状态。常汉卿的父亲早年去世,只在常家姐弟的言谈中偶然出现。而金灿烂的父亲则自始至终未被提及,相依为命的兄长在某程度上扮演着父亲的角色,却殒身沙场,只在回忆中存在。父亲在金、常二人的精神世界里以一种极其模糊的面目存在着。在金灿烂那里父亲式的意志是兄长留下的机车理想和革命信仰,而在常汉卿那里父亲留下的则是一份机车事业。它们都极度抽象而空泛,但这种隐约显现的父辈意志成为了他们人生路径的起点。在某意义上,他们所笃定的人生实践便是一场“寻父”之旅。“寻父”就是让父辈意志由抽象变得具体化,由空泛变得充实化。吴厂长的存在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他在一个又一个的具体事件情境中,对常、金二人予以帮扶、引导和教育。他填补了常、金二人在情感和人格上的缺失,更拓宽了他们在精神和信仰上的境界。这段拟亲关系在剧集的尾声以一种极富仪式感的方式被推向了前台。即将退休的吴学签给金灿烂和常汉卿做了一道铁锅炖鱼,而这道菜也是金灿烂的兄长常常做给她吃的。兄长和厂长,两个“代父”的形象在这里交叠,拼合成一个完整的精神父亲。她的“寻父”旅程也在此完成。常汉卿拿出了入党申请书邀请吴厂长做他的介绍人,随后又引用了陆游《示儿》中的千古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由此,常汉卿也完成了认父仪式。在这个家庭化的政治仪式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表征的“代父”吴学签得到了正名,获得了“示儿”的权利,成为了真正的精神父亲;而象征朴素科学精神和天真革命理想的常、金夫妇则完成了他们的成人典礼,正式接过了父辈的事业。

四、探索艰难时期的艺术表达

《奔腾年代》没有回避敏感话题和艰难岁月,而是通过有技巧、有尺度的拿捏,分辨出那些可被言说的历史记忆,使这股奔腾的热血能够穿越裂隙重重的当代历史,呈现一个在时间序列上完整连贯的故事。这种有益的艺术探索为年代剧和历史剧的创作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这些探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艰难时期的人性光辉,以坚守和乐观的积极面向来抵消现实的残酷性。《奔腾年代》表现三年困难时期时,没有过多地着墨于物资紧缺所带来的生存困境,而是着重表现了艰难岁月里人与人之间守望相助的美好。无论是匀出配额物资给乡下家人的王胖子,还是给所爱之人送去地瓜干的许凯,都象征着人性的温情战胜了生理欲求所驱动的越轨冲动。而金灿烂开垦花园种菜、在仓库里发蘑菇、教王胖子打田鼠,这些积极的应对行动,都将希望存留在了艰难岁月里,消解了人在面对不可抗力时的无力感,从而抚慰了精神层面遭受的创伤。涉及“文革”时期的情节则有意回避了暴力冲突和失序混乱,通过展现不同人物在结构性的压制力量下的内心挣扎,来揭示良善意志的存续。同时剧中人物对背叛者和越轨者的嫌恶也显示出道德秩序的韧性。这些积极因素真实地存在于历史时空中,创作者

将他们挑选出来，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给观众，有效地缓释了揭开伤痕所带来的阵痛。

二是将政治问题推入后台，以伦理审视替代政治反思。《奔腾年代》中复杂的社会冲突和权力斗争以不在场或间接在场的方式展现。代表反动势力的冯舅一直都只通过电话传声，而从未真实露面。吴厂长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情节也大都用他的“离场”来象征，或是赴京学习，或是到部里开会，或是接受劳改。这些剧情设计都将复杂而宏大的历史问题背景化。此外，创作者有意将政治风波和社会冲突降格，以人际伦理的视角来展开叙述。在剧中，冯仕高带头造反的最大动机就是想要把“受到的侮辱还给他们”。个体欲望被推到前台，成为历史阐释的基础。而暴力冲突也被有意回避，以孩子之间过火的打闹来隐秘指涉特殊岁月里的人性阴暗。正是在这样的处理中，政治性的主题批判在人际伦理中被道德化和情感化。

三是采取喜剧化的表达策略，在语言幽默中缓解历史伤痛。《奔腾年代》用轻喜剧的方式开启历史叙述，诙谐幽默的台词和逗笑打趣的情节，与伤痛的历史记忆之间，形成了一种戏剧张力，形塑了笑中含泪的审美品格。无论是常汉卿在天台和金灿烂嬉闹着晕倒，还是常家姐弟得知自己吃下鼠肉时的窘态，都十分精准地维持了悲喜之间的微妙平衡。

尽管对敏感的历史问题做了策略性的处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奔腾年代》丧失了现实主义的批判锋芒。在某种意义上，冯仕高是观众窥见那个时代结构性问题的“潜望镜”。社会治理借由非制度化的手段展开，连续的非常态成为机会主义滋生的土壤，使“讲政治”成为“讲风向”，“觉悟高”变成“嗅觉灵”。比如中苏关系微妙之际，冯仕高敏锐地嗅到了政策转向的气息，从相框中取下了留学苏联时的合影。他将曾引以为傲的经历和奉为圭臬的教旨，一时间全部抛弃，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在特殊时代的语境下，体制通过意识形态机器赋予人们身份，这个身份成为个体命运的基点。剧中，周铁锤和白曼宁终其半生所渴望的便是一个正当的身份。体制所塑造的这种欲望结构为冯仕高之流提供了搅动时局的可能性。在剧中，冯仕高因为偏执冒进，在一次违规的机车实验中失去了正常的右腿，更丧失了生育功能。这则政治寓言式的情节无疑揭示了创作者所持有的批判立场——任何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话语，都必将失去“生育繁衍”的能力，而那些滋生他的土壤终将被历史的激流冲散。

五、结 语

聚焦特殊行业，观照时代命题，是近年来中国影视剧创作的重要特征之一。当行业剧成为一个被重复生产的类型时，如何突破既有程式，寻求新的创作空间，已然成为影视行业亟待关注的重要议题。《奔腾年代》的创作者以创新实践带来新的启示。无论是填补市场空白选题方向，重组再生的类型要素，还是对经典命题的重新解读，都体现出一种可贵的创新品质和开拓意识。一部优秀的影视剧离不开精巧的创作构想，也不能缺少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观照。《奔腾年代》通过人伦关系构建了一个独具深意的隐喻系统，巧妙地将有关家国关系、社会整合、科学精神、革命信仰和民族崛起的探讨融入在生动具体的戏剧情境中，并尝试就时代命题给出自己的回应。而这种主旨探讨又深深地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境况。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提供了转型和发展的关键机遇，中国社会应该秉持怎样的科学精神和发展战略以把握这一机遇，成为时代的关键命题。火车工业作为中国科技攻关和工业建设的“名片”，回顾其奔腾历程，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下、把握未来，进而凝聚社会共识，提升发展信心。虽然该剧在人物设定上存在符号化和功能化的倾向，在少量历史细节上也存在不经意的失真，但无可否认，《奔腾年代》依然是一部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优秀作品。

参考文献：

- [1] 王一川. 主旋律影片的儒学化转向 [J]. 当代电影, 2008 (2).
- [2] 王一川. 励志偶像与中国家族成人传统——从《士兵突击》看电视类型剧的本土化 [J]. 天津社会科学, 2008 (1).